

#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18

2011年4月7日

\*\*\*\*\*

## 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 還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林春

### 北京共識？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討論的背景，是“中國崛起”。但中國在1949年“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意義上早已鉅人崛起。當然，按物質財富的總量計算，中國今非昔比。即使在科技管理上依然落後，在社會和自然生態等方面困難重重，還多少丟棄了獨立自主另類現代的雄心，農村貧困的大幅減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乃至“大國心態”的膨脹，都是不爭的事實。

與中國模式類似的提法，是意在與“華盛頓共識”相匹敵的“北京共識”。後者著眼於自主創新和重整國際秩序，很有道理，但實際上並未形成。它至少迴避了以下的現實障礙：國內，以GDP

增長為目標和出口為導向的戰略，造成可見的短期利益與長遠代價之間的鉅大落差，從社會人文到生態環境都不可持續。發展理念和公共政策中的偏差還導致大量群體抗議。國外，美國霸權之下嚴酷的國際制約不僅見於“中國威脅論”一類的敵對宣傳和經濟壓力，而且包括直接的政治、軍事挑釁。由於中國加入世界能源開發和市場，使其外部條件更加險惡。廉價勞動“優勢”不但造成中國經濟內部的過度競爭，還加劇了窮國之間在全球的零和博弈。發達國家更以流失就業機會為由，用勞工權利的旗幟置中國於道義劣勢。在這樣的衝突格局中，共識如何可能？任何容忍強度剝削、兩極分化、腐敗不公，高消耗、高污染、高度外部依賴的發展方式，都缺乏形成共識的正義性基礎和吸引力。

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則不必掩飾矛盾，並提供更寬廣的歷史視野和想像空間。中國的許多傳統和經驗，如平等、合作的社會理想和小城鎮發展等非經典現代化的實踐，無法在資本主義一統天下中求取“共識”，卻是自主改革的本土資源。同時，中國模式絕不因此而缺少普遍意義。它的形成反而有賴於在國際比較和對話中探索普適的取向或方法。

## 討論的前提

歷史視角。中國模式來自近現代中國人民艱苦卓絕追求獨立解放和繁榮富強的鬥爭歷程，有深刻的時代淵源和路徑依賴。由此上溯，又因為今日中國延續了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生成流變，也需要在歷史長時段中把握其物質生產、精神發展和在世界、周邊位置沿革的多元軌跡。最重要的，是研究建國後兩個 30 年間的不同階段，誠實面對其中的功過得失。

**中國立場。**中國立場是中國模式的題中應有之義，即依靠本土的追求、知識和資源，同時扭轉改革年代流行起來的媚外風氣。後者言必稱美國，行必求接軌，向全球化主宰的標準看齊。然而以為中國能亦步亦趨地複製歐美模式或新日韓模式，都不過是一廂情願。

**國際眼界。**中國立場針對強勢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與狹隘民族主義不可同日而語。它不僅有“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胸懷和積累，而且對外部世界取開放的心態。例如，退出“逐底賽”，聯合發展中國家改變現存少數富國執掌的遊戲規則，就是一個久違了的國際主義立場。國際眼界也是中國模式的認識論前提，即釐清中國的別樣出路與資本主義世界及其全球市場的關係。

**規範要求。**對中國模式內延外涵的界定是規範性而非描述性的。中國模式不只是一個經濟增長或政府治理模式。這是因為從歷史資本主義到歷史社會主義，或專制或民主、或集權或分權、或進口替代或出口導向，在不同的條件下經由不同的途徑，都可能成就國力和增長。如果中國模式不過是其中之一，就沒有特殊價值，也沒有示範價值。中國模式應該是關於中國現代轉型的經驗集成和規範概括，從而全然區別於蛻變成雜燴和自嘲的“中國特色”。換言之，充滿矛盾的中國現實並非中國模式的直接體現或演繹，不能通過模式構建一概加以肯定。例如，權錢聯手、資本專政、不可持續的發展主義等現狀就與中國模式背道而馳。又如背離勞工神聖的“廉價勞動”觀念，非但不能代表中國模式，還是對它的極大曲解。相反，對經濟社會的高效組織和“公善政權”，通過大量投入人力資本而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才是中國模式理所當然的成分。

說到底，中國模式的規範性格植根於它的社會主義方向，志在最終取代危機中的資本主義整合模式。從南北分化到資源掠奪，從賭博經濟到戰爭機器，資本主義已經證明不能解決世界的問題，也

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儘管目前中國並不對資本主義制度形成挑戰，面向未來的中國模式卻有著遠大的前瞻。

## 歷史準備和教訓

中國模式的歷史準備可以追溯到中國革命建黨建軍、以農村包圍城市而奪取政權的浴血征程，之後新中國自力更生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直至改革開放實行自我改進式的社會經濟轉型。三者相繼，使百年積弱的中國走上了一條利用後發優勢而獨特現代化的民族道路，向第三世界昭示了打翻身仗的可能。這一粗線條的歷史軌跡依序為以民族解放和社會革命對抗殖民現代，以群眾路線社會動員對抗蘇式官僚國家主義，再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抗全球整合。其間的複雜斷裂及未知的不確定內外因素，決定了中國模式的實驗、摸索特徵。它繼往開來，任重道遠。

以史為鑒，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擇其要者不外兩點。第一，一個人民主權、鼓勵民衆參與和監督的國家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組織健康運行的首要條件。政黨和政府的目標是造福人民，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之林。它們必須有能力、公信力和號召力來支持這些目標。第二，公民意識的張揚和健全的法制是民間批判反饋的文化和制度保障。否則人民意志架空，容忍壓制少數，迫害無辜，窒息個人自由和創造力，使社會主義走向反面，名存實亡。

同理，改革時代的經驗教訓也可以概括為兩條。通過選擇性地引進市場機制和“淺度”全球化以換取資金、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手段，是改革開放的本意。顧名思義，所謂“改革”正在於它不認同向資本主義全面轉軌的“革命”。在此大前提下，第一，國家的關鍵角色不僅是計劃經濟的邏輯，也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把現存問題歸咎於

市場化未徹底或私有制不到位，而以私有產權的確立來定義一個萬能市場，其自相矛盾的一個集中表現就是信奉市場自發力量的人卻力主政府強制推行私有化，其背後自有既得利益的驅動。第二，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民主決策。因缺少民衆建言和透明度而導致的政策失敗，在發展、分配和環境等方面已經造成慘重損失。例如第一輪醫療改革使衆多人看不起病，人民健康水平整體下降。又如激進的國企改制導致大面積下崗、滯產、國資流失和外資滲入。這些有關國計民生的決策，都未曾經過由公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所規定的公開論證。

改革前後的共同啟發，是萬勿淡忘人民至上乃是新中國的為政之道、立國之本。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不但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也是效率的源泉。理論上，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率，正是因為它克服了剝削壓迫和不公不義，從而解放出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很難設想一個勞資對抗、官民對立的社會能有多少效率。在以超高投資和超廉勞動維持的經濟中，用“效率”壓“公平”有目共睹的後果，不是效率提昇，而是血汗工廠、工傷礦難、偽劣貪腐、環境惡變。號稱社會主義的中國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 反思不是反對

事實上，公共政策問題，幹部腐敗問題，土地、三農、民族、金融、環境等問題，都已對1990年代的改革“激進化”提出質疑：如果在盲目接軌的迷霧中改成了原始積累和官資合流的搶劫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不是徒有其名嗎？當初又為什麼革命？為什麼改革？

改變這種情況的關鍵，是堅持把改革定位為一場社會主義的自我調節運動。改革初期對外衝垮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對內打破了封

閉式壟斷權力。但之後對內改什麼，不改什麼，向什麼方向改；對外引進什麼，不引進什麼，支持哪些創新，卻一直未能通過廣泛的民主討論得到澄清。

比如由於國力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舉足輕重，同時卻又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和資源，承擔美元風險和非理性的、以窮國資助富國的“雙順差”代價。又如本來並未以產權明晰為特點的鄉鎮工業，後來卻被一陣風要求私有轉軌，使一場民間創舉半途而廢。再如未能以擴展公共交通、恢復鼓勵自行車來抵抗上馬汽車工業的誘惑，造成堵路、污染、能源、油價等一系列無解難題。同時，鉅額浪費性或投機性投資造成一面是豪華樓盤空置、高鐵機場蕭條，而另一面低收入者住行緊張、城市貧困角落形成代繼的強烈對比。WTO 談判中的過度退讓，更使中國痛失一次以大國經濟規模的強勢，迫使國際分工和貿易轉向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良機。此外，一些行業和企業欣然接受外資的拒絕轉讓核心技術，讓自己停留在低端的“世界工廠”，甚至接收發達國家生產性的污染轉移。決策層中某些放棄戰略性民族工業和資本市場，允許外資長驅直入的主張，尤其誤國誤民。

承認這類問題絕不是反對改革，而是反省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失誤，保衛改革初衷，從此拉車看路。不顧漫延的社會和生態危機，以買辦身段繼續鼓動單向“接軌”，是中國模式的最大阻力。

## 什麼是中國模式？

沿著承啟和超越這兩條邏輯線索，可以嘗試給出一個中國模式的初步描述。

首先，中國模式以中國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成就

為前提：民族獨立和社會解放使自主的公民取代了半殖民地的屬民和帝國的臣民，又通過激進的經濟政策和平等運動取得了為多數落後國家所望塵莫及的發展。有效提供公共產品尤使國人在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教育程度、兩性關係等指標上在第三世界遙遙領先。一方面正視新中國走過的彎路和付出的昂貴代價，另一方面認同中國革命現代傳奇的歷史性、正當性和未來可能性，是中國模式的出發點。

這個立場的根據之一，是革命解決了土地問題。土地問題亦是基層政權問題；土改不僅摧毀了舊的地租及高利貸等剝削形式並削弱了傳統的宗法關係，而且改造了它們所賴以生存的經濟組織和政治勢力。國內外大量實證研究指出，以國有、集體和農戶承包為形式的土地關係使中國避免了城市大規模失業和貧民窟的生長；如果沒有土地公有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因素，改革甚至不可能起步。拒絕土地私有化的陷阱，依法堅持和完善對土地使用流轉的公有管理，至今仍然不但是農民生存、農村中興和農業規模發展，以及工業佈局調整、城市建設和公益事業發達的基本制度和資源保障，也是遏止土地財政流弊和房地產失控、杜絕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勾結強佔農地強拆民宅的主要手段。

說到底，守住革命和改革歷史連續性的底線，捍衛社會主義最根本的成果，是鏟除任何新生資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再次發生革命的社會條件的惟一途徑。

第二，中國模式依靠一個特殊的發展型國家。中國革命對後發展的突出貢獻之一，正是造就了一個有決心和能力調動一切人財物力來實現趕超的國家。它在反共反華的冷戰秩序和其勢洶洶的“新自由主義”先後衝擊下，依然為中國贏得了自主發展的空間。中國因此而不同於那些經歷了殖民現代的國家，僅僅作為歐

洲歷史的延伸而被動地進入世界史；而是主動地改變和創造歷史，把握住難得實現的“落後的特權”，跳躍前進。

要強調的是，既然中國模式有賴於中國人民作為歷史主體的崛起，它所規範的國家就必定是一個人民的國家，以人民主權的偉大傳統和人民的利益為立法、政策和政府行為的依據。建國以來作為集體認同的人民和作為享有個人權利的公民，在哪個時期和什麼意義上是真實的，或實際上被限制剝奪，需要重新審視。但當今資本神話取代人民神話的現實，從反面演繹著人民地位的失落。

可見“人民主權”不僅是抽象的理念。作為共和國的憲法原則和根本制度，它至少應該體現在：（1）國際上中國的民族利益和國家意志；（2）國民經濟獨立和財政金融安全；（3）全民所有的經濟和資產，包括國有土地的收益用於民族產業和民生建設；（4）選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渠道參加決策、管理和監督，對各級政府形成民主壓力。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一些精英的高調話語裡，“人民”往往在“民粹”的釋義裡成了反義詞。然而漠視人民，何談民主？法制並不是民主；民主要求公民成為立法者。中國的政治改革，終究要靠平民百姓在實踐中培育民主的民族和民間形式。

第三，中國模式以民衆的需要，社會、集體的富足和每個人全面自由的發展，而不是以剩餘價值或利潤作為經濟增長的目標和尺度。這就要求擺脫發展主義、工業主義、城市化和消費主義等流行模式，並解決“剩餘流失”這個因國際貿易中的不平等交換而長期遏止窮國致富的痼疾，以非異化勞動和消滅剝削為長遠的抱負。這也是因為道義上社會主義的規定性和現實中鐵血的國際制約兩者，都使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的老路、靠對外擴張來轉移生態瓶頸和攫取能源。

具體舉措（有些已經起步）見於把 GDP 速度指標替換為科研



開發技術昇級、節能減排防污、綜合發展和生活質量等指標；通過注資、重組等重振國有經濟，取消對外資的各種優惠；向落後地區和貧困人口增加投入，人為提高一般工資水平和農村購買力，從而抑制收入差別和產能過剩，依託本國市場發展內向型經濟。特別是改變現代化擠壓相對分散的“小生產”的常規，用控制稅率和其他相關政策扶持中小民企（如重慶財政撥款微型企業）、合作經營，開拓市場與非市場機制靈活互補的共享經濟。同時，追求經濟民主，開闢勞資共決和勞動產權的各種可能。形成富有地方民間特色的生產、交換和生活方式，還有助於克服市場操縱下的貪婪、拜金、非理性、單向度，為全球的生態型後工業轉向開路。

第四，中國模式是一個參與模式。以大衆參與來闡釋社會主義，是從國家主義的歷史局限回返社會主義的本來內涵，也是對我們時代生存困境的一個回應。而社會崛起與人民主權是同義同源的。參與模式激勵在城鄉結合、互助自治、社區組織網絡、青年志願運動、草根綠色行動等層面的，各盡所能、每個人都有機會和義務的充分參與。它推崇知識自由、資源共享、信息暢通，借鑒軟化等級、技術多能和角色多重的團隊精神與合作性競爭，旨在創造新的認識和實踐主體，進而新的思想文化和多元文明。在以直接生產者為主體的新型生態經濟和社會形態裡，在更人性、更機動、也更能開啟個體和集體智慧和創造潛能的生產過程中，實現勞動和人的解放。

著眼於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和參與意識，並快步實行社保全面覆蓋，以至公民基本收入，還將為人民贏得政治參與的後援和時間。民主問題本質上也是時間問題，是使人們從疲於奔命中解脫出來、參加自治管理的問題。勞動者只有成為共同體的平等一員，只有擺脫了對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恐懼，才能成為自由自立的公民。時間經由人民的廣泛參與而轉化成民主的力量。

參與意識作為一種文化理想，源自人民革命和人民戰爭，是中國現代性本土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遵循歷史和邏輯的統一，社會主義理念中的平等原則、民主原則、公僕原則、參與原則和自治原則也是中國模式的基本價值，是中國進路任何其他傳統都不可比擬的最大的“軟實力”。

## 中國道路再出發

中國模式的目標建構亟需一個後資本主義的想像。在理論上，先要推翻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目的論，以及現代與傳統、西方與東方、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之間的涇渭分割。從區別工業化與現代化，進而現代性與資本主義入手，才能得出現代轉型未必以工業資本主義為條件的結論。挑戰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和普遍性，讓需要的邏輯對利潤的邏輯取得優勢，正是中國模式使全球化從屬於本土需要的立意。這裡，中國認同不是一個文化概念，不是對西方的挑戰，而是一個政治概念，是對資本主義的挑戰；它的社會主義取向，也不是對未來的許諾，而是試圖利導市場經濟的進行時創舉。並且，由於資本主義的全球性質決定了其替代模式的普遍性，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在與發展中國家和進步跨國社會運動的天然聯繫中，同時具有不言自明的國際意義。

十二五規劃終於宣佈轉變增長方式，保護國有資源，減少貧富差別，打擊買辦、貪腐等目標，是眾望所歸，是對探索中的中國模式的檢驗，也是一場攻堅戰。其成敗，取決於路線和幹部，取決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者能不能重整旗鼓，再出發。